

The Inevitable Victory of the Proletariat -- Comment on the Documentary *National Memory, New China, 1949*

Zhu Tong^{1, a}

¹*School of Humanit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a3251813712@qq.com

ABSTRACT

In the form of five episodes, the documentary *National Memory · New China 1949* shows a series of historical events that took place with Peiping as the core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ighlighting the preparations made by our Party for welcoming the new regime befor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its significance. The content presented by the documentary contains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Marxist theory. It reveals that the struggle between our party and the Kuomintang is a process of fighting for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in Gramsci's sense, and the decision of Beijing as the capital has a spatial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documentary itself is a special textual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Keywords: *Marxism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cultural leadership, city memory*

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评纪录片《国家记忆·新中国 1949》

朱桐^{1, a}

¹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中国

^a3251813712@qq.com

摘要

纪录片《国家记忆·新中国 1949》以五集的形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以北平为核心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凸显了我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为迎接新政权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其意义。纪录片所呈现的内容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它揭示了,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所体现的是争夺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的过程,而定都北平则具有空间政治意义。此外,纪录片本身则是“文化记忆”的一种特殊文本呈现。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文化形态领导权 城市 记忆

1. 前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共产党击退国民党而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有着无可替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当时革命胜利前夕的一切现状,决定了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必然性。在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主力军已经被消灭,有如纪录片中所呈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然成为定局,中国共产

党也面临建立建设新中国的重大考验,最终经过民主协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正式建立,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纪录片《国家记忆·新中国 1949》以文化的形式记录了这一伟大进程,以点带面,深入浅出,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还原历史,真正传递关于国家的记忆。

2. 无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除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外，还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源和依据。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具有超越资产阶级而独有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构成了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纪录片中呈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一次决定新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它从宏观上布局了执政党即将面临的各方面任务。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要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此，“两个务必”成为一种阶级意识，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身上传承下来。

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论述，卢卡奇是重要的理论家，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做了详细的阐发。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成为必然的趋势。然而，革命的成功与否有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有着怎样的阶级意识。按照研究者的观点，在卢卡奇的理论中，阶级意识始终是领导阶级行动的指南：“首先，在广义上，任何一个阶级都应当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即对于自身社会历史地位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把握，这种理解自觉地或自发地引导这个阶级的行动。”（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38页）

从狭义上讲，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超越资产阶级意识的特殊性，它建立在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基础上，它认为人应该在历史中成为主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而非像处于资产阶级社会中被“物”所奴役，在这样的阶级意识的指导之下，无产阶级也在不断地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在卢卡奇看来，它是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此外，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正如卢卡奇也同样肯定了革命政党的重要作用：“革命组织应以高度的阶级意识为先决条件，而‘阶级意识’的独立表现，——即共产党——的内在发展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王伟光，张峰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323、334页。）

其次，在与国民党进行的终极较量中，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是至关重要的力量，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企图建立的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并且最终，是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的领导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想要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除去用暴力手段推翻旧有的国家机器统治以外，打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文化阵地战”成为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区分为两个层次，即“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前者指国家、政府等政治活动领域，后者则指的是文

化、伦理以及意识形态的活动领域，它包含政党、工会学校等民间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新闻媒介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此部分参考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70页。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是相对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而言更隐蔽的一种统治方式，他称之为“文化霸权”。无产阶级革命要通过对于市民社会的控制，使大众能够接受一定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和体系价值，在这两个社会层面同时进行变革，才能确保最后的胜利，从而完成卢卡契意义上的“整体性”的革命。研究者指出：“他把政治社会比作外围的壕堑，而市民社会就如同其背后牢固的防御工事，国家机器容易被摧毁，稳固、复杂的市民社会则难以被突破。而一旦统治阶级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受到削弱，国家也就进入了危机状态。”（葛朗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教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94页）

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国情，运用各种媒介手段在“市民社会”层面传播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传播革命的新思想，从而为党取得广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共产党人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如在纪录片中所展示，在中共中央整个的斗争过程中，媒介宣传工作从未停止，无论是北平的和平解放，还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当时的人民日报都有相应的宣传策略，这也从另外的一个层面，印证了列宁所说的文艺工作的党性原则，也即文艺工作的阶级性，文艺工作只有紧紧跟随某一政党的领导才能不断的发挥积极影响。纪录片最后所展示的开国大典，也可以在广义上看做在党领导下的特殊的宣传活动。通过党的文艺工作不断推进，革命才能源源不断地深入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在“市民社会”层面不断扩展，最终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局面。；另外，中共中央考虑定都北平，也是因为这里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此外，在革命的过程中，党的一切重大决定都是通过会议来决定，并且，其中的知识分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也都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整个建国初期各种重要的决策。并且，按照葛兰西的观点，文化领导权的取得，正是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不断“协商”、“谈判”的结果。

3. 阶级革命与城市

整个纪录片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讲述，基本以北平这座城市为中心展开，包括北平的和平解放、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以及在北平定都以及最后的开国大典等等，凸显了北平这座城市对于整个社会历史革命的承载。事实上，有关于社会历史革命与城市之间有较为复杂的关系，有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过研究和探讨。研究者列斐伏尔将城市看做一个特殊的空间，而空间本身就存在政治性的意义。从而他认为城市之于革命

有着重要的特殊性。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对象；它一直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37页。）也就是说，对于某城市空间的占领，是一种政治性的标识。研究者谈到，“列斐伏尔确信，爆发革命的中心区域是社会的中心城市而不是边缘地带，城市是革命的中心，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中心，是‘空间生产’的中心。”（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350页。）

列斐伏尔对于城市空间的重视，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足，他认为阶级的冲突往往也体现在有关空间/区域的冲突，对于城市的争夺也是对于意识形态的重塑。片中呈现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政治上占领北平这一独特的城市空间，并且要对这座城市进行改造、清理等工作，从而使它真正面貌一新，真正成为新中国的一部分，为新的政权所服务。这一行为，同样具有政治性的意义。列斐伏尔指出：“以历史性的或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37页）

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也指出，从这一时期开始，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向城市进行转移。

4. 关于新中国的“文化记忆”

新中国的建立，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纪录片以口述访谈的形式采访了许多亲身经历这一过程的人，如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等，他们可以直接回忆某些具体的事件。同时，片中还有历史研究者，他们对于这一历史分析形成另外一种叙述。纪录片通过技术化的手段将这些记忆融汇在一起，采用画面加解说的方式，使之以某种故事化的叙事面貌呈现出来。

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上看，记忆研究者保罗·康纳顿认为，通过记忆而形成的对于历史的口述有提供保存和记录人类行为的作用：“事实上，或多或少属于非正式的口述史，是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3页。）

新中国的建立，在这些人的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构成了一种“集体记忆”。每一个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经历这一事件，他们的回忆与讲述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这一事件的整体。通过集体记忆的形式，纪录片向我们传递了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融媒体环境下历史影像的创新表达——评电视纪录片栏目〈国家记忆〉》一文的作者指出：“在国家、民族认同建构的过程中，影像媒介中的集体记忆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龙念·腾文琪：《融媒体环境下历史影像的创新表达——评电视纪录片栏目〈国家记忆〉》，中国电视，2020，31页。）

通过影像，接受者可以更加直观、形象地去与回忆者的感知相连接，从而形成自己对于新中国建立这一主题的新的印象。这是既书面回忆、录音口述回忆之外对于记忆形式的另外一种补充。纪录片《国家记忆·新中国1949》作为个案，是整个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的一部分，对于这部影片的分析，可以看到，整个纪录片的意义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更加凸显出来。肖伟在对于中国纪录片研究的文章中指出：“纪录片以记录不可复现的时间和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显示出特殊价值。”通过纪录片的呈现与表达，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影像记录这三者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整体。关于记忆的文化研究与关于影像呈现的美学思考有了进一步的关联性。如肖伟所言：“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纪录片都作为历史的立体档案和现实的文献笔记而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生动、详实的历史资料。”记忆也由纪录片的形式向公众传播，并将获得进一步的认可，由此焕发新生。

文化研究者徐贲对于记忆有深刻的研究，他认为记忆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一个群体都相当重要：“记忆显示的是人的群体存在的印记。这是人不能没有记忆的根本原因。”（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序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第1页。）

每一个参与记忆的人也都是历史的承担者，他们肩负了传承历史的责任。同时，被传承的“集体记忆”也与每个人的“个人记忆”密切相关，“集体记忆”不仅仅是个人记忆的汇总，更是对于个人记忆的另外一种保存形式，它使原本单个人零散的记忆凝聚在一起，具有了新的面貌和意义。如徐贲所说，“从人的存在价值和与之相称的，有尊严的公共生活来思考记忆，记忆就会对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为什么记忆？记忆什么？以何种形式记忆？偏重什么记忆对象；如果在记忆中汲取人类共同的教训？放弃了直接见证者的个人记忆，就从根本上断绝了集体记忆的可能。”（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序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第1页。）个人的讲述是除去博物馆、纪念碑等物质化的存在的一种储存记忆的新形式。同时，这一纪录片本身也是对于历史的一种记忆和呈现，它是文化的一种符号化的书写。

事实上，无论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都承载着一种对于历史的责任感，是对于过去的一种真实的记录和呈现，目的在于使得这些真实的存在可以在时间的长河中与遗忘相对抗。如研究者所说：“作为首档国史栏目，《国家记忆》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集体记忆，重塑了一个精神共同体，在引领社会主流价值导向、凝聚民族情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龙念·腾文琪：《融媒体环境下历史影像的创新表达——评电视纪录片栏目〈国家记忆〉》，中国电视，2020，31页。）

因此，这一纪录片在客观上起到了构建国家历

史、塑造国家形象、培养大众爱国情感的重要工具。

5. 结论

有如研究者申健枫所说：“考量一部纪录片的好坏，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是“真实性”。纪录片《国家记忆·新中国 1949》便是对客观历史很真实的把握与呈现。又或者，如研究者龙念，滕文琪所说：“我国早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多以宏大叙事为主，通过鸿篇巨制的方式，实现对国家话语权的彰显，强调纪录片的宣传和教化功能，随着新媒体以及媒介融合发展，受众的观看习惯和审美理念不断被改变，与此同时，在后现代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展现个人话语的微观叙事开始盛行，以微视角记录个体的生存状态并注重体现人文关怀的理念和手法，成为当下电视媒体和纪录片创作的共同趋向。《国家记忆》栏目的选材，涵盖了国史、党史、军史等多方面的历史事件，场景和题材相对宏大，但编创者选择从历史细节入手，以小切口带入大视角，让细节推动观众去感知历史，触碰历史。在将历史事实作为根本依据的基础上，以故事化的手法，赋予枯燥的历史以温度和质感”。（龙念.滕文琪：《融媒体环境下历史影像的创新表达——评电视纪录片栏目<国家记忆>》，中国电视，2020，31页。）

随着新中国的不断发展，纪录片这种形式也在随着技术、观念等的革新更新它本身的面貌。但始终不变的，是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与传播，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承担的重要的历史责任。如研究者指出：“因此，媒体有责任和义务激活并建构人们对重大事件的关注和认识，从而加深群体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通过影响资料，我们可以准确把握新中国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历史证明，人民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党在解放战争的最后时刻以及新中国建立之初，始终保持着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是人民群众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事实证明，这是一项伟大而又正确的选择。而纪录片，正是通过一种技术手段将过去的这一历史事实呈现出来的方法。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走过了风雨征程，在今天，我党回顾和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更好地做到为人民服务，为百姓谋幸福，带领中国人奔向全面小康的新时代。

REFERENCES

- [1] Luacs, G., (1989),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2] Wu.N.(2007), Criticism of daily lif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3] Yi, J (2008),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Marxism, Beijing.
- [4] Connerton, P, (2000), How Society remembers, Shanghai.